

杨贤江教育思想研究

YANG XIAN JIANG JIAO YU SI XIANG YAN JIU

孙培青 郑登云编

SBP11/12-09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杨贤江教育思想研究

孙培青 郑登云 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杨贤江教育思想研究

孙培青 郑登云 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中山北路3663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吴县美术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 字数: 285 千字

1989年10月第一版

1989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1—2300本

ISBN 7-5617-0111-X/G·053 定价: 4.

目 录

- 学习杨贤江的教育思想 张承先 (1)
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杨贤江 潘懋元 (6)
- 论杨贤江的教育起源论 金立人 (49)
杨贤江的革命教育思想 毛礼锐 (60)
谈杨贤江的教育本质论 喻立森 (68)
论杨贤江的教育本质两重性 金立人 (106)
杨贤江关于教育本质问题的创见 陈桂生 (116)
杨贤江论教育的经济意义
——读《新教育大纲》 刘力 张立红 (120)
- 浅谈杨贤江的职业
教育思想 叶文翰 周新华 汤长根 (129)
- 杰出的青年运动领导人杨贤江 潘懋元 王增炳 (136)
学习杨贤江关于青年教育的思想 陈本铭 (142)
杨贤江青年教育思想初探 罗 波 (151)
试论杨贤江的青年教育思想 贾笕恒 (168)
- 学习杨贤江同志的德育思想 张 举 (179)
读稿札记 钱忠源 (191)
杨贤江德育思想钩玄 钱忠源 (203)
杨贤江德育思想成因浅析 沈生杜 (214)
- 杨贤江的教学论思想 宋恩荣 (227)

- 杨贤江教学论思想浅析 崔运武 (236)
杨贤江教学思想初探 邵晓峰 (253)
略谈杨贤江同志的教学观 方生 (261)
杨贤江同志论课外活动 方生 (264)
杨贤江同志谈自学 张举 (267)
杨贤江体育思想初探 郑志林 (274)
杨贤江论教师 张举 (279)
试论杨贤江的教师观 宋恩荣 (290)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典范

- 读《教育史ABC》 郑登云 (299)
杨贤江与教育史研究 任钟印 (306)
杨贤江和国故派的斗争 宋恩荣 (312)
研究杨贤江教育思想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 张如珍 (326)
[附录一] 杨贤江传略 潘懋元 (331)
[附录二] 杨贤江教育思想研究部分论文目录索引 (340)
[附录三] 《杨贤江纪念集》目录 (346)

学习杨贤江的教育思想

张承先

杨贤江同志，又名李浩吾，中国共产党党员，1895年出生，1931年逝世。他虽然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但在他短促的一生中，投身革命，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起了启蒙的作用，对当时的青年运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是党在文化教育战线上一名忠贞而坚强的战士。在教育理论和指导青年的工作上，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特别是在现代教育史和青年运动史上有其光辉的地位。今天我们学习杨贤江的革命精神和教育思想，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1928年以后，杨贤江以主要精力从事教育理论研究工作。这一时期所写的《教育史 ABC》、《新教育大纲》两部著作，奠定了杨贤江作为新兴教育理论先驱者光辉的历史地位。《教育史 ABC》是我国第一本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研究教育史，根据社会发展形态来叙述教育发展过程的著作；《新教育大纲》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阐明教育原理的、理论紧密联系中国实际的著作，也是杨贤江最主要的教育著作，集中反映了他的教育思想。

杨贤江的《新教育大纲》以及其他教育论著，大多写作于二十年代末期。这个时期的旧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进行侵略，军阀连年混战，官僚买办重重压榨，农村破产，民不聊生，文盲占全国青壮年百分之八十以上，知识青年彷徨苦闷。在教育上，帝国主义进行文化侵略，推行奴化教育，国民党政府把教育作为蒙骗人民，压制革命的手段，推行所谓“党化教育”，搞专制愚民政策。而资产阶级学者和教育家，却

幻想通过教育，改良政治，拯救中国。他们空喊“普及教育”，鼓吹改良主义。许多教师和学生，则迷信教育是超轶政治的“清高”事业，埋头教书、读书，不过问政治。面对着这些复杂情况，杨贤江认为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联系中国当时的实际，“解释教育的本质，说明教育的作用，辟除对教育的迷信，纠正对教育的误解”，分清理论是非，使一般青年学生，对当时的教育性质有所认识，使有志于社会变革的教师和青年，掌握理论武器，以之指导革命实践。他对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反动的教育政策，给予无情的揭露，坚决的打击；对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各种错误观点与主张，摆事实，讲道理，分析批判。他指明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和教师、学生的革命责任。他将传播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建立中国新兴教育科学理论，作为当时从事理论研究的战斗任务。他对于理论工作的重视，体现了一个文化教育战线上的革命者的气魄和远见。

杨贤江在二十年代所提出的许多重要的教育论点，至今仍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他指出教育同经济基础有着依存关系，教育要受生产方式也受政治制度制约，同时，又对经济的发展，政治的变革起一定的促进作用。

他认为教育“是社会所需要的劳动领域之一，是给与社会的劳动力以一种特殊资格的。”教育是由于社会生产劳动的需要而产生，并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发展起来，教育同生产劳动本来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到了阶级社会，教育成为阶级统治的工具。他揭露了以往阶级社会教育的特征，指出教育权跟着所有权走，教育只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他用无可否认的大量事实驳斥了资本主义教育是所谓“社会化”、“平民化”、“公平化”、“和平化”等等骗人的谎言，指出资本主义教育存在种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

他批判了当时流行的种种错误的教育观点，如教育“神圣”、“清高”、“中正”和“独立”，指出这是对教育本质的曲解；他又批

判了当时夸大教育作用的种种理论，如“教育万能”、“教育救国”和“先教育后革命”，指出这些错误的理论是歪曲教育与革命的关系，企图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以教育代替革命，这是对当时的革命事业有害的。他认为要变革当时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只有进行革命；在革命中，教育应当作为“革命武器之一”；在革命胜利之后，“教育是保卫政权并促进政权的一种机能”。

他指明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与道路，就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和《哥达纲领批判》中所提出的教育理想与原则。而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中间，必须经过一个无产阶级专政时期，这个时期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学校教育必须进行改革。

他还指出教师是不占有生产手段，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劳动者，属于被统治阶级而不是统治阶级。教师应当组织起来，参加革命，“只有革命的教育者，才是中国需要的教育者”，帮助被压迫人民求解放，也是为了自己的解放。教师“不但应当指导学生去革命，还应当指导群众去革命”，应当走向社会，与工农群众结合，教育者自身也要受教育。

杨贤江从事革命活动和理论工作不过十年左右，但他遗留给我们的著、译却很多。据现在所搜集到的资料统计，他在报刊上发表的论文、短评、译文共三百多篇；写给青年学生的通讯二百多封；回答青年学生的问题约近千则。除《教育史 ABC》和《新教育大纲》外，他翻译了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平克维支的《苏维埃共和国新教育》等六部著作。

杨贤江的教育思想和指导青年的言论，在当时和后来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是“五四”以后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新文化主力军在教育理论方面的先驱。它象一发威力巨大的炮弹，轰击着旧中国反动统治下的教育；象一把锐利的解剖刀，剖析了改良主义的教育理论；也象一把火炬，照亮了青年前进的道路。许多青年学生，把他引为知心朋友，向他倾吐内心的思想感情；许多教师和学生，在他的启发影响下，走上了革命的大道。他所写的

著作，被国民党政府列为“禁书”，但却受到广大教育工作者和知识青年的热烈欢迎。《学生杂志》在他主编期间，销量激增；《教育史 ABC》和《新教育大纲》两书，多次再版重印，这在当时是少见的。《新教育大纲》在苏区以及后来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还成为师范学校和教育工作者的重要教育读物之一。

杨贤江同志逝世到今天，已经五十周年了。他的逝世，使我们党当时失去了一位忠诚的党员，使教育战线失去了一位优秀的理论家，也使全国进步青年失去了一位深受尊敬和爱戴的老师。然而，他的精神，至今仍鼓舞、激励着我们去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他的著作，至今仍是剖析资本主义教育，研究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遗产。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二十年代就已确信并大力传播的革命教育思想，至今仍然光彩夺目；他当年奋不顾身、坚持不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行动，至今仍感人至深；而他所走过的光辉道路，正是革命的知识分子思索、探求的必经之路。

在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充满信心，在党的领导下，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的今天，我们纪念杨贤江同志，就是要：

学习他坚信马列主义原则，坚信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党的领导，献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坚持真理，敢于斗争，鞠躬尽瘁，奋斗终生的革命精神。

学习他重视教育理论，把它作为革命的重要工作，为建立新兴教育理论而勇挑重担、高瞻远瞩的精神。

学习他热爱青年，同青年思想感情息息相通，对青年谆谆善诱，为指引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健康成长而呕心沥血的精神。

学习他勇于探索，独立思考，紧密联系群众，深入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精神。

学习他高度的组织观念，忘我的劳动态度，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认真负责，一丝不苟，朴素踏实，平易近人的优良品质和

作风。

(摘自张承先在纪念杨贤江同志逝世五十周年大会上
的讲话。题目为编者所拟。全文载1981年8月19日
《光明日报》)

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杨贤江

潘 懋 元

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杨贤江同志(1895—1931)，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他短促的一生中，不但对传播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奠立中国新兴教育科学有突出的贡献，而且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成为文化教育战线上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青年运动领导人。

解放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解放日报，都曾为纪念杨贤江同志出过专刊；各师范院校的教育史教材，都为研究杨贤江教育思想列出专章。1981年，是杨贤江同志逝世五十周年，为此教育部和共青团中央联合召开纪念大会，号召全国教育工作者和青年，学习杨贤江革命精神和教育思想。这篇论文，是笔者二十年前研究杨贤江教育思想和近来重新编辑《杨贤江教育文集》的一些体会。借以纪念这位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先驱者。

一、杨贤江生平及其思想发展过程

杨贤江，字英父(或作英甫)，又名李浩吾，笔名有曲它、姚应夫、李谊、叶公朴、李洪康、李膺扬、柳岛生……等^①。1895年4月11日(阴历为3月17日)生于浙江省余姚县一个贫苦的成衣匠家庭。1906年进溪山初级小学堂读书，1911年在诚意高等小学毕业后，1912年留任该校教师，同年秋考进杭州市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浙江一师，当时有不少知名学者任教，如经亨颐(校长)、李叔同(弘一法师)、夏丏尊、陈望道等。杨贤江除认真学习正课，各门课程均取得优异成绩外，还遍读中西书籍，对宋明理学，尤

潜心研究。在校学习期间，经常参加各种学术活动、社会活动和写作教育论文。1917年毕业后，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斋务助理、教育科助理等职，除随班旁听教育、心理方面的课程外，同时参加商务印书馆附设函授部英文科学习，并开始翻译国外教育论文，发表于浙江《教育潮》等杂志。

1919年，杨贤江经邓中夏介绍，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同年十一月，南京的会员组成南京分会，他被选为分会书记和分会会刊《少年世界》编辑，负责编辑“学术世界”、“劳动世界”等栏，还参加南京高师学生所办的《少年社会》编辑工作。1920年7月，同李大钊、恽代英等七人被选为领导少年中国学会的评议员。

1919年7月，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召开大会，围绕着学会要不要有共同主义和会员的政治活动等问题，共产主义者同国家主义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对杨贤江思想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他认为学会应该“是个向着光明方面进行，同时是个反抗国内恶势力的团体”。所以，“当然是应当从事革命”，“做改造的事”。后来，又和邓中夏、恽代英等共同努力，为学会制定了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肃清政局，提倡国民自决主义，反对教会教育及文化侵略政策等纲领。

1920年9月，到广东高要县，拟就任该县国民师范补习所教务主任。该所因粤桂军阀战争未能开办。杨贤江在高要困处达五十天，深切地体会到军阀的残暴和人民的疾苦。

1921年至1926年间，杨贤江在上海负责《学生杂志》的实际主编工作^②。他经常为刊物撰写短评，揭露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抨击封建军阀黑暗统治，剖析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回答学生的思想、学习、生活各方面问题，引导学生参加政治运动。短评立论新颖，简要生动，揭露深刻，批判尖锐，深为广大青年学生所喜爱。同时，发表了许多教育专论，也深受读者欢迎。

1923年，恽代英同志到上海开展共青团工作。杨贤江在他的积极影响下，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参加革命斗争，阶级觉悟有

了很大提高，世界观有了根本的变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帮助恽代英编辑《中国青年》。

从1923年到1926年这四年间，杨贤江在党的领导下，努力从事文化教育战线上的革命工作，除主编《学生杂志》和参加《中国青年》编辑工作外，还在《教育杂志》、《新女性》、《民铎》、《觉悟》等刊物上发表论文。但是，他的主要阵地仍是《学生杂志》。这个时期的《学生杂志》，内容充实，战斗性强。杨贤江所写的短评，已经具有初步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能够配合党的宣传方针。例如，为支持唐山大学生援助开滦矿工罢工运动，写了短评《唐山大学生和开滦矿工》，指出学生运动应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在《五月可纪念的》、《列宁与中国青年》等短评中，称颂“马克思是有组织的群众运动的先驱”，是“为被压迫阶级鸣不平的伟人”，列宁“是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他也是全世界被压迫阶级的革命领袖”。为鼓励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讨论革命问题，他在《学生杂志》上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苏联革命书籍以及《响导》、《前峰》、《中国青年》等进步刊物。还组织各种青年问题的书面讨论，并开辟了“通讯”、“答问”等专栏^③，发表全国各地青年来信与编辑部复函，答复青年们所提出的问题。根据青年们的通讯加以分析综合，杨贤江还写了许多理论联系实际的有关教育问题和青年问题的论文。如《中国学生运动与青年运动》、《中等教育与青年问题》、《中学训育问题的研究》、《学生生活改造论》等文章。对学生运动的目的、组织、策略、方法和青年的学习、生活等方面的问题，发表了很多精辟的见解。他所写的短评、通讯、论文等，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政策，引导青年走上革命道路，起了积极作用。因此杨贤江在当时知识青年间，享有的很高的威信，受到他们的尊敬和爱戴，许多青年把他引为知心朋友^④。同时，也就受到军阀、学阀等反动势力的敌视和迫害^⑤。

这个时期，杨贤江参加许多实际的革命活动。他时常同商务印书馆工人讨论革命问题；到郊区农村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协

助他们组织农会；在上海学生运动中担负领导责任；他经常在党的会议上和瞿秋白、恽代英等同志研究宣传工作。1924年被选为中共上海地方兼上海区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和所属“国民运动委员会”委员⑥，分工负责学生方面的工作，担任了当时国民党改组后的上海市党部青年部长，利用公开职务和场合，给青年学生演讲革命道理；到杭州、宁波等地进行党的组织活动。此外，他曾在上海大学附属中学兼课，兼任上虞春晖中学教务主任，每周来往于上海、上虞之间，都是和当时的革命活动有关。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他和沈雁冰、侯绍裘等同志组织“教职员救国同志会”，参加讲演团，向学生、工人、店员做《五卅运动与民族革命》、《民众的力量》等专题演讲。五卅运动后，被选为国民党左派所组织的上海特别党部委员，继续领导学生运动，坚持斗争。

1926年底，北伐军逼近上海，上海工人运动、学生运动蓬勃开展，杨贤江的革命工作更加忙碌，不得不离开《学生杂志》，全力以赴地投身到当时的革命斗争中去。他参加了上海工人起义组织工作并亲临斗争现场。1927年春，北伐军攻克杭州后，曾到杭州担任过短期的《国民日报》编辑。“四·一二”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在上海、浙江等地通缉他，党把他调到武汉北伐军总政治部工作，担任《革命军日报》社长。“七·一五”武汉汪精卫又叛变革命，他于1927年秋，经江西辗转回上海，转入地下活动。在这个艰难的岁月里，杨贤江对革命事业抱着镇静的、乐观的态度。由于白色恐怖日甚，被迫于年底流亡到日本。

在日本流亡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一刻也没有停止革命工作，由于形势和环境的改变，不可能继续活动，杨贤江就积极从事研究和翻译工作。他搜集了大量的日本教育资料，分析研究资本主义社会教育情况；撰写、编写和翻译了许多社会科学和教育论文、专著。《教育史ABC》就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

1929年5月，由于日本警察的监视和迫害，生活也很困难，杨

贤江回到上海。他深感到革命理论建设的重要性，主动向党提出承担新兴教育科学的研究任务，在组织的支持下，他以惊人的毅力在最后的两年中，继续写作和翻译教育论著，完成了《新教育大纲》这部辉煌的教育著作。同时，继续参加革命活动，和彭康、吴亮平、杜国庠、冯乃超等参加文委领导工作；同其他同志一起发起组织了“社会科学家联盟”。

由于工作繁重，生活困难，积劳成疾，杨贤江患肾脏结核症。复至日本就医。不治，不幸于1931年8月9日在长崎逝世，终年三十六岁。骨灰由李一氓同志运回上海，葬于上海永安公墓。

杨贤江在短促的一生中，除了参加革命活动之外，译著甚丰。笔者所已搜集到或查明的，就有论文三百八十多篇，译文三十多篇。译书有《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恩格斯著）、《世界史纲》（日本山下德治著）、《青年期的心理和教育》（美国荷尔著）、《苏维埃共和国新教育》（平克维支原著）、《新兴俄国之教育》（日本上田茂树著）等，并编写《今日之世界》一书；教育专著有《教育史ABC》和《新教育大纲》两书。

从上述论文、专著以及平时的书信和当时战友于他身后所写的纪念文章中，可以见到杨贤江的一生，是由一个富有正义感的知识青年成长为一个具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无产阶级立场的革命者的一生。在他短促的一生中，其思想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每个阶段，又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各个阶段和各个时期的.思想发展，从他所发表的论著，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发展的线索与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在1922年以前，这个阶段的特点是：他虽然看到军阀统治下的中国社会种种黑暗现象，要求变革社会，但对于马克思主义还知道得很少，还不可能认识到社会问题的本质，也不可能找到变革社会的正确途径。他的哲学观点，是徘徊于唯心唯物之间；他的教育观点，基本上还是属于“教育万能论”的。

这个阶段前后约十年。前数年，即1919年以前，他在师范学

校学习和在南京高师任职期间，就广泛地博览中外的哲理和教育书籍，深受宋明理学、欧洲人文主义以及康德的思想影响。一方面有唯心主义观点，如认为人的本质意义在于有“人格”，“人格”包括道德与理性，人有绝对价值与自由意志，其特色有四，为自我意识、自我活动、自我发展、自我牺牲^⑦；甚至认为人生的幸与不幸“多生自各人之心，非皆左右于外界之事情，故吾人欲灭不幸，惟有以善意存之”^⑧；认为“理想不受制限于历史，历史为理想之产物”^⑨。但在另一方面，又有唯物主义的倾向，如认为“欲明事理，不能外事物而他求”^⑩；“一时代之思潮，决非偶然而生，必其前有所承，其后有所归”^⑪。同时，他吸取了宋明理学家重视实践的精神，吸取人文主义者重视人权的思想，而扬弃了独善其身、个人主义的思想。反对“莫管思想”，提倡兼善，提倡互助合群。认为“莫管思想”是自私自利的开端，青年必须为集体的利益而修养德性^⑫。在教育思想上，他提倡学生要“集会”、“自治”，这只是为了“互相提携，共策进行”，以启发合群思想，增进知识经验^⑬，而不是政治上、革命意义上的组织。他重视有秩序的生活、学习上的自动，广泛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特别强调体育、德育、智育的并重。认为“若培养己材，而偏于体育，责获而已；偏于德育，程朱而已；偏于智育，仪秦而已；必兼三育，融合精彻，始能成为完人”^⑭。

1919年的五四运动，对于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影响很大，杨贤江又于当年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接受了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也开始接触到一些马克思主义思想。接着，他从南京到广东，从广东到上海，看到军阀统治的黑暗，帝国主义侵略的残暴，社会上贫富悬殊，人民生活痛苦；这些，深深地激发了他的爱国主义和正义感，使他更多地面向现实，考虑社会变革的问题。1921年以后，又由于他负责编辑《学生杂志》，广泛地接触到青年学生的各种问题，必须研究这些问题的发生原因与解决方法。因此，第一阶段的后期，即从1919年到1922年这三、四年之间，他从书本到

现实，从学校到社会，思想上起了一些显著的变化。主要是对于社会问题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唯物主义的倾向也比较明显些。但是从整个思想体系来说，他还只是一个民主主义者而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下面就他的哲学观点和对社会问题的认识，举例说明他这个时期的思想发展情况：

在哲学观点上，他虽更多地倾向于唯物主义，但仍不能摆脱唯心主义的影响。1921年，他在同一年所写的《论思想》和《美育的价值》两文，便显然地代表着两种观点。在《论思想》一文中，他正确地指出：“一种思想的发生，决不是凭空而起，一定有它的背景。”“时代改了，环境变了，自有相应的思想要发生出来。即发生之后，又自然要增长扩大不容人力去阻遏的”^⑯。在《美育的价值》一文中，则认为美育的价值“就在使我们能脱离现实社会的束缚，另在一个理想的境地得著喜悦，以扩大人生的活动”^⑰。在《文艺与人生》一文中，他一方面暴露了社会的黑暗罪恶，另一方面却认为社会欠缺“感情的醇化”，因而要借文艺来弥补，因为文艺是“超出‘俗界’，直接与‘自然’同化的”^⑱。一般来说，在面对社会现实时，他比较能够从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问题；而在理解像“美”、“道德”这些抽象概念时，中国的“良知”，欧洲的“理性”，康德的以至于蔡元培的唯心主义的哲学、美学观点却还不是他在这个时期所能摆脱得了的。同样，对于社会的现实问题，他已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而对于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却还是唯心的。如说：“一切的社会改造运动，如政治的、经济的，都不及教育的有根据、能永久。因为教育的改造，是改造人的思想的。人的思想是足以支配政治及经济的”^⑲。所以说，这时候他基本上还是一个“教育万能论”者。

在社会问题的认识上，他痛切感到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军阀政治的压迫，指出“腐败的官僚，野蛮的军官，刻薄的资本家，都是要剥削人民的劳动利益，才能享受他们豪奢放纵的生活”。也